

呂芳上的「反思」： 在治學與歷史中求時代啟示

呂芳上給人的感覺，是一個謙虛而嚴謹的學者。曾經擔任過台灣「國史館」館長的他，依舊保持着學術至上、研究第一的人生信條。在接受本報記者訪問的過程中，呂芳上講述了他對治學、歷史研究的方法與原則、近現代中日關係及其歷史啟示的看法。從呂芳上對歷史的見解中，依然可以感受到他深邃的歷史洞察以及宏觀性的整體思考。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呂芳上是在前來香港城市大學參加「超越國族的歷史學與戰爭責任」國際學術研討會過程中，接受本報記者的獨家專訪的。而他是次前來香港進行學術專題報告的主題，乃是「以血還血抑或以德報怨：對戰爭倫理與責任的一個反思」。

■ 呂芳上



治學研究乃理想的人生

曾經擔任過「國史館」館長的呂芳上，仍舊是一典型的學者風範。他說，作為一名學者，會擁有廣闊的學術空間，有條件去推動自己的學術理想，所以是純個人性的。而擔任「國史館」館長，則是介乎於政治和學術之間，畢竟，「國史館」直屬於「總統府」。所以，作為一個行政單位，「國史館」考慮的乃是長遠的問題。

而在重要性上，呂芳上認為，「國史館」的重要優勢乃是保存史料，尤其是涉及到兩蔣的歷史文獻，吸引了包括中國大陸學者在內的眾多學界人士前來查閱。而過去蔣介石日記的出現，也推動了對相關歷史的研究，所以「國史館」也成為了一個學術交流的平台。據了解，「國史館」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職能。呂芳上說，在不斷開放史料的同時，「國史館」也會召集學術會議等活動，而出版學術成果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

精通歷史的呂芳上對於學術研究，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他認為，研究歷史，需要對多元進行掌握，而這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學者自己的心態。所以，一個學術會議，應當讓不同觀點的人進行交流。不過，歷史觀的多元是否會影響到歷史研究的客觀性呢？呂芳上表示，多元雖然很好，但是許多學者並不知道站穩自己的立場，一些歷史事件，資料已經公開，而如何去詮釋這些資料，則完全憑借學者自己的良心；當然，他認為，也能夠從一個學者的立場中，去看到一個人如何使用史料。但無論怎樣，應當最低限度地降低自我的主觀色彩。這是歷史研究特別需要注意的。

警惕戰後的日本社會

呂芳上今次來香港，乃是參加一個和中日戰爭歷史有關的研討會。作為一名研究歷史的學者，呂芳上卻沒有脫離對現時的觀察。他對當前的日本社會以及中日關係的觀察，展現出了非常濃重的歷史厚重感。

呂芳上認為，戰後的日本，無論從哪方面而言，已經重新站了起來。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之下，日本出現了對過去發生的戰爭進行合理化解釋的現象。在他看來，這是一種民族主義的國家論述，以此來進行

戰爭責任的逃避。

此外，另一個在呂芳上看來不能夠忽略的現象是：日本社會存在着一種「服美不服中」的心理情結。具體而言，日本社會認為當初在戰爭中，乃是被美國打敗，而非中國；而遭遇到原子彈襲擊的歷史，也使得日本社會出現了「受害者」與「加害者」二者意識混合的情況。在不久之前，美國總統訪問日本廣島，這一舉動在呂芳上看來，也有可以討論的地方。他說，那一天，是美國的國殤日，作為美國總統，應該去向美國軍人行禮。但是美國總統卻去了廣島。雖然美國官方一再表示，不會就當年對日本使用原子彈道歉。但是在呂芳上看來，從實質上而言，訪問廣島這一舉動本身，便已經是一個「隱晦的道歉」。

呂芳上直言，戰爭的反省，需要的是客觀，日本在這一方面顯然做得還不夠。該如何讓這一段歷史不被後人忘卻？他表示，一方面，是各種歷史資料要盡量公開，同時，對參與過戰爭的老兵以及受害者的口述歷史工作也要進行；畢竟，在戰爭中，受害最大、最無辜的，是百姓，所以這些人對戰爭的回憶，也最為親切。

有一種觀點認為，今天的日本已經是民主國家，所以不可能走上侵略或是擴張的道路。呂芳上表示，歷史是不能夠假設的，也不能夠預測。他認為，日本是一個資源少的國家，向外發展乃是必然；需要討論的，乃是這種「向外發展」的形式和相對條件。呂芳上並且舉例：美國亦是繁榮的民主國家，但仍發動過伊拉克戰爭。所以，現實政治在呂芳上看來，有時是難以預測的。

歷史的教訓：國家需要強大

在甲午戰爭結束之後，當時的清國掀起了留學日本



■ 七七事變紀念石碑。

的高潮。該如何看待這一歷史現象呢？呂芳上認為，當時的中國人已經認識到了國家的落後，希望通過學習西方，達到以夷制夷的目的；而在向外學習的過程之中，最為方便的途徑便是日本，所以便產生了留學東洋的熱潮。不過，呂芳上認為，日本人是看不起中國的，對中國人有輕視之感。而作為一個國土狹小的國家，日本需要市場，所以隨着軍國主義的興起，便與中國又一次出現了戰爭。

不可否認，近年來，無論是在日本抑或中國大陸，歷史學界都存在或流行這樣一種觀點：歷史上，中日之間的戰爭是由一系列偶發因素造成的，所以二者的戰爭不具有必然性，也是可以避免的。對於這樣的看法，作為一名資深的歷史學者，呂芳上認為：中日當時是否必有一戰，乃是偶然性與必然性因素的結合；而歷史的小因素、偶發因素，是不會影響大歷史的趨勢的。因此，在他看來，某種程度上，戰爭幾乎是難以避免的。

經歷了戰火與鮮血的洗禮，今人可以從戰爭的歷史脈絡中找到怎樣的啟示？呂芳上告訴記者：今人，需要在思考中反省自我，追溯歷史；而根本上，則是國家需要強大，那便不會有外侮。

採訪手記：



■ 1937年8月14日，空軍戰神高志航與日本空軍作戰，大獲全勝。

歷史不是數字的堆砌

在人們研究歷史或是閱讀歷史學著作的過程中，進行一種概括和總結時，定量分析或是定性分析所帶來的數字統計是不可缺少的。例如，在一場戰爭中，究竟有多少人傷亡、多少人失蹤、多少人失去家園，都會成爲一個又一個的統計數字，成爲後人引用的文獻和資料呈現出來。所以，在歷史學的研究中，數字統計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不能夠忽略的是，每一個數字統計的背後，其實代表的都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個家庭所經歷的悲涼的故事。呂芳上接受記者訪問時表示，歷史是需要正義的，因為在任何一場戰爭中，受到最大傷害的，便是平民。這一觀點，可謂是對唯數字主義觀念的一種批判。的確，我們不能夠僅僅只是看到戰爭中的數字統計。因爲失去一個生命，和失去一百個生命，其實同樣是對人性的傷害。在過去十多年有關中日戰爭歷史問題的爭議中，時常有日本方面的右翼人士質疑南京大屠殺的受難者人數。但是，在筆者看來，這種爭論的核心應是以怎樣的心態去面對日軍當年的暴行。從這個意義上說，關於人數的爭議，並不能夠成爲一些人否認日本軍隊暴行的理由和藉口。因此，歷史是由一個個鮮活的生命組成的，而不單單是數字的堆砌。 文、攝：徐全



■ 南嶽忠烈祠抗日陣亡將士總神位



■ 為紀念抗日陣亡將士而豎立的石碑，呼籲遊人保持肅穆。此碑位於湖南。



■ 衡陽會戰紀念碑



■ 抗戰中中國軍人的鋼盔

歷史、國族與責任

呂芳上前來香港城市大學參加的「超越國族的歷史學與戰爭責任」國際學術研討會取得了圓滿成功，這也是香港首次舉辦類似議題的學術研討活動。本着對歷史的負責精神，包括呂芳上在內的眾多學者就中日關係的歷史與未來，談了自己的看法。

例如，來自中國內地的學者徐勇便從日本的軍國體制的形成與戰爭的決策角度反思了日本的近現代歷史。他認為，日本明治維新之後，由於軍政關係的特殊演變，延續了中世紀武家私兵的情形，產生了隸屬於天皇的皇軍，因而近代形成的文官控制軍隊的原則被一再挑戰。他認為，近代日本幾乎每隔五年至十年便要對外發動一次侵略戰爭，龐大的戰爭機器使得軍隊的力量迅速擴充。而在這一過程中，日本軍人屢屢挑戰文官政府，最後乾脆形成了軍人組閣的局面。可以說，日本的軍國體制，與戰爭爆發具有非常深刻的內在聯繫。

而來自日本的學者則強調，應當特別警惕的是，今天的人們絕對不能夠掉入到歷史修正主義的陷阱中。可以說，整個研討會，圍繞歷史、國族、責任等議題展開，取得了諸多的學術共識。

文、攝：徐全



■ 研討會現場

不能忽略的美日「共犯結構」

今天的日本，已經解禁集體自衛權，而且對當年對外發動戰爭的歷史所進行的解釋，日本官方的立場也開始逐漸保守化、右傾化。這樣的時局發展，令人對日本以及東亞的前景產生出憂慮之感。值得一提的是，不久之前，日本和韓國就慰安婦問題達成了協議。記者也就這一系列問題向呂芳上求教其看法。

在呂芳上看來，日本向韓國，就慰安婦問題作出道歉，是一種片面的道歉。其原因在於，呂芳上認為，慰安婦不僅有韓國人，海峽兩岸均有女性受害者在其中。但是，日本政府卻沒有向海峽兩岸作出任何形式的道歉，所以，這種致歉當然是片面的、有差別的。而類似於南京大屠殺這樣的歷史事件，在呂芳上看來，文獻均已經公佈出來，但是至今，日本仍舊有人否認這段歷史。

更值得關注的，在呂芳上看來，是美國與日本存在的某種程度上的「共犯結



■ 中國軍隊的大刀隊在抗戰中

構」。他認為，從日本作為實質武裝力量的自衛隊的形成，到自衛隊從專守防衛改變成向海外派兵，每一個步驟，背後都有美國的影響力，所以，某種程度上，日本走到今天這個局面，是美日共同形成的。這一點，在呂芳上看來是不能夠忽視的。呂芳上對記者表示，歷史是需要正義的，讓歷史的真相還原，是歷史研究者的責任，也是知識分子不可推脫的職責。

文、攝：徐全